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2008年 第3卷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第3卷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大管理研究. 2008 年第 3 卷. 1/ 李新春主编.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058-6992-9

I. 中... II. 李... III. 企业管理 - 文集 IV. 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112 号

责任编辑: 文远怀 卢元孝

技术编辑: 潘泽新

中大管理研究 (2008 年第 3 卷 -1)

李新春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036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0.5 印张 165 000 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8-6992-9/F.6243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大管理研究》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工孟	上海交通大学
陈信元	上海财经大学
Michael Firth	香港岭南大学
黄俊英	高雄 中山大学
贾建民	香港中文大学
李维安	南开大学
刘常勇	高雄 中山大学
陆正飞	北京大学
毛蕴诗	广州 中山大学
钱共鸣	香港中文大学
Joachim Schwalbach	柏林洪堡大学
王重鸣	浙江大学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
吴世农	厦门大学
张 华	香港中文大学
赵曙明	南京大学



中大管理研究

2008年 第3卷(1)

主 编 李新春

副 主 编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辛 宇 徐莉萍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范辛亭 兰 宇 石凤波 苏 琦

吴佩勋 辛 宇 徐莉萍 张书军

目 录

- 1 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反思与展望
蔡 祥
- 29 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整合——以日立与摩根热陶瓷为例
吴斯丹 毛蕴诗
- 55 公司治理、政府控制与现金持有
高 雷 张 杰
- 71 中国股市行业系统风险的差异性检验及扩展研究
汤光华 张 彬 张智谋
- 88 投资者税负差异、税率变动与除息日股价行为——来自A/B股公司的证据
曾亚敏 张俊生
- 109 本土化和全球化并存下的企业责任和公司治理
V. V. 米勒 D. W. 肯特
- 141 市场导向、质量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杜 鹏 万后芬

CONTENTS

- 1 A Critical Review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Accounting Theory
Cai Xiang
- 29 The Business Portfolio Integration of MNC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Hitachi
and Morgan Thermal Ceramic
Wu Sidan Mao Yunshi
- 55 Corporate Governance, State Control and Cash Holding in China
Gao Lei Zhang Jie
- 71 Both Test and Expansion 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atic Risk
in China Stock Market
Tang Guanghua Zhang Bin Zhang Zhimou
- 88 Investors' Taxes Variation and Ex-Dividend Day Stock Pric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ese Dual Class Ownership
Zeng Yamin Zhang Junsheng
- 109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Governance Emerging Local and Global Simultaneously
Van V. Miller Dan W. Kent
- 141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Market Orientation, Quality Orient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Du Peng Wan Houfen

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反思与展望

蔡 祥^①

摘要：本文从实证会计理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以宽广的视角检定了目前主流实证理论的主要背景假设，并探讨了其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论文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性框架，对目前实证会计主流理论和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发展进行了批判性地审视，提出了我们关于实证会计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展望。中国的实证会计尽管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种前景不应是对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发展过程的简单重复。

关键词：实证会计理论、背景假设、信息观、契约观、计量观

JEL： M41, N01

^① 蔡祥，副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53200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0402008）的资助。

一、引言

中国的实证会计撇开方法论的争论,真正进入研究的实践几乎还不到十年的时间,然而其所呈现的方兴未艾之势,使每一个关注会计学术的人都感受到了其对传统会计研究范式倾覆式的影响。^①这种影响的产生无疑与国际主流刊物的研究导向有关,反映着学术市场竞争的国际化,以及我们对主流学术潮流的追赶。然而,这种追赶往往致力于技术的实现,而忽视了理论本身的思考,很可能削弱我们对学术市场真正需求的关注。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无论是会计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努力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因为这是会计信息的立身之本,同样,作为以提供知识为己任的学术研究(我们不妨把它看成一个信息系统),其自身的相关性也不能不作为研究者首要关注的一个问题。^②

早在1991年由美国会计学会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部分学者针对会计研究的现状,就尖锐地指出,以实证会计研究为主流的美国会计学术研究正在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Demski、Dopuch、Lev等,1991)。这种危机之所以在“会计革命”(Beaver,1998)二十多年后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于增彪等,2004),比如学术团体的自我封闭,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实证会计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障碍,或者说进入了某种误区。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依然没有完全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尽管一些可喜的迹象已经出现(Reiter和Williams,2002)。以历史的演变历程来评判,这种危机离我们似乎还很远。现有国内文献对实证研究的批评,主要还是停留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上,比如刘峰(1997),对于实证会计理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则缺乏清醒的认识。然而,从目前的实证研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理论探讨的滞后已制约了实证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本文对于实证会计理论的反思,算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革命性的理论跨越一般与研究方法的转变

^① 现在,在许多会计学科的重点院校,会计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中如果不带一点数字、公式或者表格,恐怕就很难毕业。

^② 对比一下高等学校近二十年的专业设置,我们不难看到许多专业的消失,或者地位的衰落。

有关,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会计理论研究从规范转向实证;在特定的研究方法下,比较大的理论进展往往来源于理论体系的更迭或理论重心的转移,例如,实证会计理论的“契约观”在 70 年代末的突起;一般的理论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设计的改进,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上。然而,理论的推进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依赖于我们对理论假设的置疑。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研究假设基础之上,对应于前面三种不同的理论发展模式,这些假设也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研究者哲学信念(比如,什么是知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他们在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选择。Hopper 等(1985)将会计研究分为三类:主流会计研究,解释性会计研究和批判性会计研究,不同研究方法区分的主要依据就在于它们在本体论、认识论上的差异。^①国内外其他相关的讨论包括 Chua(1986),陈珉、孙铮(2003)等。

二是理论或逻辑推导的前提假定。科学研究的实践很大程度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构成了某一具体研究或某个研究领域的背景假设。然而,这些或明示或隐含的假设的有效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或者立论之初就与现实不相吻合,对这些假设的不断检定与质疑,推动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Longino, 1990)。在对规范研究的批评中,一个重要的论点是,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这一批评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并不意味着,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假设就是不证自明的,它同样需要检验和判别。

三是研究的具体假设或推论。这一点往往是普通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一般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研究假设与其理论基础的逻辑一致性如何;研究假设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针对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在这方面的问题,汤云为和赵春光(2001)已经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论述。蔡祥、李志文、张为国(2003)对大量文献的批评性评述也正是从该点出发的。

本文的反思将不再停留于方法论的争论,由于哲学基础假定的不同,在可见的未来,这种争论是不可能停止的,也不会着眼于具体研究方法的改进,

^① 本体论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会计现象到底是仅仅存在于研究者的意识之中还是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认识论涉及的问题则包括,当会计信息被认为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时,我们如何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是通过纯粹的理性推理,还是通过对会计现象的经验观察?

后者虽然可能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为精确，但一般无法改变我们对研究结果的基本认知。论文的分析将集中于假设的第二层次。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的专门研究非常少，另一方面，厘清理论的背景假设，对于实证会计理论本身，以及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证会计理论重心的每次重大转移或突破，往往都是建立对前面理论背景假设的放弃或重大修正基础之上的。对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来说，由于研究基础的薄弱，我们在实证会计的基本理论上几乎完全奉行“拿来主义”。然而，在吸收西方的实证会计理论并应用于中国的问题研究时，如果不对其理论假设进行深思熟虑的检验，我们所从事的研究设计很可能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从理论视角对实证会计研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在这一问题背景的基础上，第三节从实证研究的基本假设出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性框架。基于上述框架，第四节以契约观为核心，对目前实证会计主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地审视，第五节则对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发展进行了评述。第六节提出了我们关于实证会计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展望。最后为本文的结论。

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主要问题：理论视角

90年代以来，美国会计学术研究所呈现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理论本身的进展问题。大部分理论研究都有这样的特征：伴随着周期性的重大发现，新的观念和概念会不断地创造出来。比如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金融学的资产定价理论上就从CAPM模型，发展到APT模型，然后发展到期权定价模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是这种结构性的进展，无论是在会计的资本市场研究领域，还是在会计选择领域，都不存在；二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与金融、医学等其他的应用性学科不同，会计理论工作者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研究成果似乎并没有为实务界和政策制定者所广泛采纳。下面我们对这两点进行更详细地论述。

1. 实证会计理论：尴尬的解释力

实证会计研究在理论发展上的迟缓不过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内在的

问题在于本身的解释力。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Watts 和 Zimmerman, 1986),这是实证会计研究将自己区别于规范研究的角色定位。然而,无论是基于信息观,还是基于契约观的大部分研究,其模型的解释力都是很低的,前者也许还可以归咎于会计信息本身,后者却与理论本身难脱干系。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实证会计理论对于经济学的过度依附。

在很多会计学的研究中,经济理论通常被用作解释会计问题的便捷工具,会计数据分析所展示的一切结果似乎都在为各种经济理论寻求注解,而理论本身作为一种假说所期待的经验验证却被搁置了。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理论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对其工具化的使用,也使得经济理论无法在会计的具体环境中得到真正的整合。当经济理论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时,出现我们频繁地引用经济学文献,而经济学文献对我们的研究却视而不见,也就不奇怪了。显然,改进的途径在于,应该尽量避免任何理论的神圣化,甚至在理论被证明无效时,果断地放弃它,换句话说,经济理论只是我们用于解决实际会计问题的一种工具而已(Reirter 和 Williams, 2002)。^①

同时,作为高度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在应用于会计实证研究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与具体的会计问题,包括会计问题所处的丰富与复杂的环境相融合的问题。在很多实证研究中,我们所看到的联系往往是很脆弱的,甚至是牵强的。这种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脱节,反映了理论的抽象性在提高解释的普适性的同时,所面临的经验化的困境。因此,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我们必须审慎地考虑背景假设的性质及其应用的经济学模型的适应性,必要的时候可以对理论进行修正,或者从其他学科中寻求更具解释力的替代性理论。比如,契约观之所以无法对公司会计选择行为提供充分的解释,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公司都选择了相同的会计方法组合,对于这一现象,目前的会计选择研究所依存的经济理论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忽视上述会计选择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从更为广阔的角度,寻求更为细致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是可选择理论的来源之一,但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值得我们同样的关注。

2. 实证会计在中国:理论的缺位

目前,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的问题,总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属于

^① 这一问题在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西方较少依赖经济学理论的行为会计研究已自成一体,而在中国,行为会计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研究的环境问题,比如缺乏适合的学术刊物,研究者严谨治学的精神不足等(蔡祥等,2003);另一类属于研究自身的问题,比如实证理论的缺乏。正如陈珉等(2003)所指出的,“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可以说,目前相当一部分冠以实证分析之名的研究,其实只能称之为描述性分析,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支撑,这些研究的假说只不过是统计结果的一种事后描述,其所阐述的变量关系很难说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一种真实揭示,而不是某种偶然的统计联系。

克服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提出独立的分析模型。然而实现这一点是很难的,也是中国目前的实证研究最为缺乏的,它考验着研究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洞察力,而不是面对数据时的计算能力,后者可以通过课程的培养迅速地建立起来,前者却难以找到速成之道。突破理论瓶颈的一个更为便捷的方法是,在借鉴西方成熟的模型时,仔细地辨别其背后的基本假设,然后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进行适当的修正。运用这一方法的潜在限制是,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在复制别人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创新性,同时,对于特定的中国问题,我们可能根本找不到适当的替代模型。

上述两种方法都要求,在对实证研究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地考虑到中国的制度背景。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这种对于制度背景的考虑被简化为宏观政策、规章制度的介绍。当然,在研究的初期,这种介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这种介绍最多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背景,要把制度背景转换为合理的假设,还需更多的理论化努力,也就是说,对制度背景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理论性的构造和分析。

制度背景嵌入相应的模型或理论化,要求我们从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区分长久性因素与暂时性因素,根本性因素与表面性因素,对于干扰性因素的过多考虑只会降低我们模型的生命力和解释力。那么,哪些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呢?我们可以提出的关键一点是政府的影响力。在美国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则自发地调节着各个主要经济领域,中国则仍然强调政府的某些经济管理职能与经济计划的计划性,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几乎不存在。在准则的制定上,美国的会计准则是会计惯例的考虑与各方力量(企业、

政府与业主等)博弈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准则的制定则完全由政府的意志主导(冯均科,2004)。在资本市场中,政府的影响同样无处不在,从股票发行、上市与再融资的审核、股权分置,到上市公司高度的股权集中,政府都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尽管政府行为存在测度的困难,但纳入理论或模型分析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陈晓和李静(2001)就从税务竞争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然而,要从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分析,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3. 实证会计理论与应用:臆想的实践性

实证会计研究尽管从一开始就以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为己任,但其实践的意义并不如规范研究那样明确。Watts 等在其 1978 的经典论文中提出,实证会计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驱动会计准则制定的各种压力来源,会计准则对于各个利益团体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各种利益团体愿意耗费资源去影响准则的制定过程。然而,这里的“我们”是否当然地包括会计实践工作者以及准则的制定者,还是值得怀疑的。

同时,实证研究报告中往往充满了实践启示。对这些启示进行归纳,我们看到了如下关于实证会计理论的应用性论断(蔡春、邹宏,1999):为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提供预测企业据以编制财务报表的会计政策和程序的有益模型;有助于管理人员安排企业收益的时间序列以便减少政治成本,促使信贷者和管理人员去制定可减少代理人成本并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契约;有助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颁布准则之前就能预测各方面可能作出的反应,以便对会计准则的合理性作出评判……,等等。

上述论断的真实性如何?对于实证会计研究,曾有大量的研究从方法(如 Ball 和 Forster, 1982)、理论(如 Hunt 和 Hogler, 1990)、逻辑(如 Christenson, 1983)以及道德基础等方面提出了批评,对于这些批评, Watts 和 Zimmerman (1990)的直接回应是,他们“没能经受住市场的检验,因为他们对于会计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虽然, Watts 等实证会计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信奉市场的检验,但是,在学术圈(一个相对狭小的市场)中占据了垄断性地位的实证研究,它的研究结果是否为执业会计师、企业的会计人员、关注会计信息的投资者等(一个相对学术圈来说要大得多的市场)所认可或接受,依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

显而易见,实证研究的作用或者说其立身之本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前面的陈述表明,我们自然而然地相信了实证研究在增进市场效率上的

作用,这是否是对市场效率的一种低估?监管者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实证研究的结论或发现(哪怕是作为颁布新政策的“借口”)?会计师、管理者、投资者在他们编制或利用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实证会计理论多大程度为他们所认知,并影响到具体的决策?甚至是在会计的教学领域,实证会计理论对传统教学体系的影响都是值得怀疑的。对于这些置疑,目前的实证研究无法给出肯定性的答复。而来自于学术界之外的评价则更为尖锐。比如,一位实务工作者在读完一篇实证论文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这篇文章对于实务工作者没有任何意义,就我的理解,它也没想这么做”(Pearson, 1976)。

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局限。实证会计研究解决不了金融衍生工具的确认、计量问题,也解决不了合并报表编制方法与外币折算方法的选择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却是会计信息的编制者与使用者所需要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研究者具有高度的理论创见,对于它们的检验与认可,正如延续数百年的复式簿记技术一样,既不会在实验室里完成,也不可能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得出,而是最终将在实践操作中实现。

其次,实证研究方法在应用过程中的过度简化也限制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实证研究应力求揭示规范研究的意识错觉以及纠正人们习惯性看法或感性认识上的直觉偏差,即应当检验被常人所未注意到的但又重要的假设,应当校正普遍性的意识偏差,以发挥科学证伪的效果”(冯均科, 2004),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很困难的。

最后一点则与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有关。由 Ball 等(1968)在 60 年代末期开创的会计革命标志着会计研究向着科学化努力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会计学术界与实务界分裂的开始,现在,无论是在交流语言上,还是在基本的兴趣上,两者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Bricker 和 Previts, 1990),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彼此的正常沟通。这也许是会计革命所产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三、实证会计理论的背景假设：一个分析框架

前面所述的实证会计理论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与其研究的背景假设有关。任何的经济理论，它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未必现实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不准备对这些背景假设提出置疑，经济理论在会计研究中的应用，对我们理解会计现象就很难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下面我们就从实证会计的研究对象出发，探讨其背后的基本假定，及其这些假定在会计理论发展过程中所折射的影响。

1. 实证会计理论背景假设的分析框架

实证会计的主要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市场（这里不仅包括股票市场，还包括经理人市场，借贷资金市场，甚至政府的管制行为也可以看成一个市场），个体行为（投资者、分析师和经理人员等）以及会计环境。对于这三者的特征，我们可以分别从两个极端的纬度来进行刻画，比如，市场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它的效率的高低，在一个极端，市场可能是完全无效的，而在另一个极端，则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当然，现实的情况可能处于两个极端的某一点上。由于这三者是密切关联的，一般而言，当我们选择一定的研究对象时，其实同时已对它的特征以及其他两者的特征作了假定，这种假定贯穿在我们的研究设计以及理论解释之中。表1提供了市场、个体行为以及会计环境三种对象的特征纬度。虽然其他的纬度划分可能同样有效，但我们认为，表1的刻画将更能全面地反映背景假设的作用。^①

表1 研究对象的背景假设：特征维度

研究对象	特征		
	无效		有效
市场			
个体行为	非理性		理性
会计环境	急剧变化		稳定

市场的有效性反映了市场价格对市场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的反映程度，

^① 有研究者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假定之一（甘道武，2004），然而，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质量与其说是研究的假定之一，不如说是一个具体的有待检验的问题。

其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以及市场行为者的理性。在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说中，仅仅考虑第一个方面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上，交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投资者又被假设为完美理性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有效市场假说不符的经验证据的出现，人们开始对投资者的理性程度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其他市场条件下，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很重要。比如，在经理人市场中，由于经理人能力与行为的不可观察性，交易双方就必须签订一定的薪酬契约来保障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需要签订和保证协议的执行，相关的交易成本也出现了。在特定的情况下，如交易者的诚信度太低，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有效协议的签订成为不可能。显然，一个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很高的市场，其效率不可能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由于市场价格受到太多噪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是非常困难的（陈小悦，1997）。

任何市场都是由一定行为个体构成的，对于会计研究来说，会计师、管理者、审计人员以及投资者等构成了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在我们对这些对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一个潜在的假定就是关于其理性程度的判断。理性的界定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另一种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在社会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这里的理性取其第一种含义。经济学中的完美理性假设，将投资者的决策过程抽象成一个理性投资者追求主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但是实际研究表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呈现出一些与前面假设不相符合的特征，比如，人们总是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从而对新信息的重视程度过低，反应不足；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个决策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而非着眼于最终的财富状况；在心理预期的过程中，对预期的损失过于敏感，而对已经形成损失的东西却表现出一种“处置效果”，期待有机会收回成本而继续经受可能的损失；在决策的过程当中，行为者表现出从众心理、模糊规避等等一些心理现象；同时，需要决策的问题以何种方式呈现在决策者面前也将影响决策行为，即所谓的“框架效应”。这些都不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行为方式，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却是被证实经常发生的。对于个体行为特征的判断，同样影响到实证会计的研究。当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或总体上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非理性状态时，从人类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借鉴相应的理论来解释会计事实，将是更合适的选择。